



# 追寻中国的“现代”： “多元变革时代” 中国小说研究1937—1949

Contending for the Chinese Modern:  
The Writing of Fiction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ve  
Epoc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9

王晓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追寻中国的“现代”： “多元变革时代” 中国小说研究1937—1949

Contending for the Chinese Modern:  
The Writing of Fiction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ve  
Epoc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9



王晓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中国的“现代”：“多元变革时代”中国小说研究 1937—1949/  
王晓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  
ISBN 978-7-5161-4407-7

I. ①追… II. ①王…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1937~1949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997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骆珊  
责任校对 邓晓春  
责任印制 王超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3.5  
插 页 2  
字 数 598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目 录

导论 .....	( 1 )
----------	-------

## 第一部分 调商“梦魇的现代”:沦陷区文学

导言 .....	( 41 )
----------	--------

第一节 简介 .....	( 41 )
--------------	--------

第二节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雅俗文学”和“中阶文学” .....	( 49 )
----------------------------------	--------

第三节 张恨水早期致力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努力及其局限 .....	( 68 )
---------------------------------	--------

第一章 无法建构的“新女性”之梦:以萧红和梅娘为例 .....	( 83 )
---------------------------------	--------

第一节 无“家”可归的灵魂和错置的乡愁:流亡经验与萧红的 “离散文学” .....	( 83 )
--	--------

第二节 “新女性”的双重陷阱:梅娘对殖民地社会的小说叙述 ..	( 112 )
---------------------------------	---------

第二章 被围困社会中的婚恋综合征:张爱玲“闺阁小说”中的 身份焦虑 .....	( 132 )
--	---------

第一节 个人主义处于危机中 .....	( 133 )
---------------------	---------

第二节 “琐屑描写”中的历史和政治无意识 .....	( 182 )
----------------------------	---------

## 第二部分 重思“分裂的现代”:国统区文学

导言 .....	( 193 )
----------	---------

第一节 简介 .....	( 193 )
--------------	---------

第二节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再评价 ..	( 199 )
----------------------------------	---------

<b>第三章 异化的心灵梦想同一：无名氏和徐訏“现代文人小说”中受制的世界主义</b> .....	(241)
第一节 无名氏的“中产阶级罗曼史”和“反成长小说” .....	(245)
第二节 徐訏的“现代志怪传奇” .....	(260)

<b>第四章 “主体性”、个人主义与失败的“成长小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困境与路翎的“新左翼小说”</b> .....	(274)
第一节 “主体性”的丧失、寻求和失效 .....	(278)
第二节 承认的政治与“风格”的政治学 .....	(302)

### **第三部分 求索“新民主主义的现代”：解放区文学**

<b>导言</b> .....	(331)
第一节 简介 .....	(331)
第二节 建立新的“文化—政治民族”的尝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认识 .....	(352)
第三节 创建“革命新文化”的困境 .....	(370)

<b>第五章 “民族形式”和“问题小说”：转变中的农业社会和赵树理的“农民故事”</b> .....	(378)
第一节 乡村社会在历史性大变动中 .....	(380)
第二节 赵树理故事及其形式的另类现代性 .....	(395)

<b>第六章 从“新女性”到“人民的批评家”：丁玲身份认同的转变与她的“新女性小说”</b> .....	(414)
第一节 从无政府主义“新女性”到“为大众”的文化工作者 .....	(415)
第二节 “革命新文化”创造中的彷徨与矛盾 .....	(432)

<b>结语</b> .....	(455)
-----------------	-------

<b>附录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美国</b> .....	(464)
----------------------------------	-------

<b>附录二 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b> ——以王德威的研究为中心 .....	(484)
---	-------

<b>附录三 论一种现代文艺理论新概念：“中阶文学”</b> .....	(501)
--------------------------------------	-------

<b>参考文献</b> .....	(518)
-------------------	-------

## 导 论

在现代中国百余年风雨中，我们见证了不同政治与文化势力为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而厮杀竞争，看到它们为此倡导形形色色的“新文化”，并将其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介绍予国人并推行于世。这一趋势在20世纪40年代尤盛：国民党及其建立的“国民政府”宣扬新传统主义伦理并提倡“新生活运动”；日本侵略者及其支持下的沦陷区伪政权极力传播一种“新”的、“卫生”的、“健康”的、据说是能免除颓废西洋文化影响的“王道乐土”文化；中国共产党则在其创建的“解放区”内宣传建立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加入这些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阵营，以追求他们的理想、梦想或幻想。众所周知，自晚清（或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为争取建立一个“新”的、“现代”的中国社会而斗争。

“如何现代、怎样文学？”是王德威的一本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论文集的题目。<sup>①</sup>这个标题的内涵在他的另外一本论文集《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变得更加明确。<sup>②</sup>以作家的“想象”来连接（articulate）实际的历史发生和作家创作，既是作为研究者的王德威一向操持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的逻辑结果，也是这种“新历史主义”想象史学和政治理念的一个投射或折射。应该指出的是，对于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实际斗争，永远不单纯是由“想象”得来的“理想”或“幻想”的产物，而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不足、错误乃至罪恶，出自不同立场与理念得出的现实性救治方案。因此“反映”或连接现实历史发生的事物的文学创作，也不仅仅是想象的产物。但无论现代中国的作家/知识分子们的立场如何，他们大多

---

① 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湾）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 2 追寻中国的“现代”：“多元变革时代”中国小说研究 1937—1949

都认为这个“新”的社会应当在民众的政治参与上更加民主、在阶级等级和社会关系上更加平等、拥有民族独立、在社会中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简言之，对于拥有阶级性内容的公平、正义的“现代”价值的追求，超越了对于建立在宗法社会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基础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遵奉。这种对“现代（的）中国（的）”的追求同时是争夺文化领域内的领导话语，而后者是对如何进入“现代性”（一直以来被理解为如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或如何进入不同路向的“现代性”的竞争。这些文化“战线上”的各派势力的斗争在其时社会分化、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境下，并不比政治领域内的斗争少些许残酷：我们见到不少文化左翼人士被国民政府当局肆意逮捕、枪杀或暗杀，而右翼与自由派文化人士也受到共产党一方的抵制和批评。无论持何种主张，他们都在为民族的未来争夺能一统天下、独领风骚的制高点和优先权。

在这一总体形势下，这一时期出现了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小说创作。它们是对变动的历史经验的记录，也可以看作是对作者心中或清晰的政治—社会视野，或其“政治无意识”的具象结晶、表达、连接或投射。他们笔下的20世纪40年代社会都呈现了与传统社会有各式差异的多种“新文化”的面貌，而一些作者即使是贬抑性的描写其实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对不同于其时异化社会形态的“新”文化的呼唤。在这种呈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各种政治文化力量对不同现代性进路的调商、幻想、反思和争夺。因此，“如何现代、怎样文学？”这一或多或少预设了“现代”只能是单一面孔的议题应该转换其思路<sup>①</sup>，从“怎样现代、如何文学？”这一强调历史发生学或对历史经验生成过程中考察的方向重新进行思考。

本书研究这一时期（1937—1949）在三个政治上分据的区域（它们也正好成为三个有各自内在动力和运转机制以及流通、消费、阅读体制的文化场域），即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的小说。这一导论分成四部分。首先它将解释为何选取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作为研究课题。接着，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将被简要陈述。然后，这个课题目前在（英文）

---

<sup>①</sup> 表面上看，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所阐发的是一种“多元现代性”的观点。但其实，在先入为主地认定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被“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所压抑和扼杀的论断下所拒绝的，正是对不同现代性竞争的消长的历史过程的检视和探讨；而坚持某种文学面貌更为优越，更为“现代”，也因此“本应”留存甚至战胜他者。这实际上有意无意所操持的正是“单一现代性”的观点。参见本书附录二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谈论。



学界里主要的著作和论文将被简要但较全面地检视，它们的优缺点被加以说明；在这其中本书的结构也将得到提纲挈领的交代。最后它对什么是中国的“现代”，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历程的内涵，即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从理论高度上再度加以思考和概括。

### 时代精神：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变革时代”（1937—1949）

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的三十年（1919—1949）经常被称为“大时代”，而它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经历巨大发展变异的时期。这个“大时代”的兴起以新兴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为标志，而以新型“党的知识分子”与左翼文化工作者号召发动的“新启蒙运动”与共产党致力创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文化）政治上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而三十年的“大时代”里包括政治、文化在内所有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激变最集中的十年，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第三个十年。这并不是巧合，也并非政治左右了文学的后果。政治和文学的互动不是简单的反映论下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需要在一个更复杂的互动模式中加以认知。在此期间，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同现代性方向的尝试和探索得到了集中的锻造、测试、竞争和协商。因此，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作一个整体的“大时代”中的“多元变革时期（时代）”。“变革”是这一时期常见的一个词语。艾思奇1937年在宣扬“新启蒙运动”之时即提出：“文化上的自觉运动的出现，常常预示着一个社会变革运动的酝酿成熟。”<sup>①</sup>而“变革”（transformative）一词也可以避免在如“过渡时期”这样的称谓里所隐含的目的论叙事。

无论在社会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如果我们说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9—1927）是以一个激进的反传统权威与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以及个体解放潮流中如火山般爆发的人能量的涌动为其特点；第二个十年（1927—1937）以一个以较快速度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或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以及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强劲的保守主义（及它与敌对的、激进的左翼思潮的论争与政治上的殊死搏斗）的出现为其特征；那么，在这第三个十年，随着第二个时期内已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以1931年东三省事变为标志）在这个十年之始全面进行，所有上述这些历史经验都找到了渠道来充分发展和实现它们的潜能，而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所有

<sup>①</sup> 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文化食粮》1937年创刊号。

可能性与局限也都在此汇合，以形成达到各自极致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域。如果说，五四运动一般被认为是鸦片战争（1839—1842）后中国人“师夷以制夷”，力图自强以御外侮、再造和复兴民族的第一个新起点，那么这一时期则可以看作是现代中国百年来追求现代性的一个尖峰时刻。

在这一时期，抗战的全面爆发终结了国民党政府的国族建设规划，也使国内经济状况恶化。但抗日战争也使国内敌对的政治力量团结起来御侮。长期积弱压抑的民族士气一度重新高涨，而文化民族主义也由此复兴。我们所研究的三个区域都展现了具有鲜明而迥异特征的文化图景与文化政治。

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可以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危机（包括它的内在矛盾）与这一特定历史时刻日益加深的社会政治冲突的关联来加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从体验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的洋务运动开始，长期以来致力于以各式各样的方案来振兴国族与文化。从1915年前后到20年代，他们发动了新文化运动，这其中包括了1919年左右发生的五四运动。反权威主义、猛烈攻击孔教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凸显在它的动力学中。张旭东曾辩证地指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双重的：“它是一种拆解既存的意义结构或系统的思想努力”，也是“一种拥抱被视为在体格与道德上都已经腐败了的传统之外的新的现实的整体性重新定向”；就后者而言，它是“一种系统地、持续地寻找一个能保护新出现的、建基于社会之上的个体性的新的意义结构，在社会、道德、象征领域内的新秩序的不懈努力”。<sup>①</sup> 为完成这一目标，许多知识分子提倡全盘西化、将“德先生”与“赛先生”引进中国以消灭国族的落后状态，在婚姻与恋爱中提升性别平等与自由选择的权利，以攻击传统家庭制度与推动个人解放。他们意识到现代化不但要求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而且也要求在人们的思想中引发革命。

20世纪30年代见证了将这些现代观念植根于中国社会以便体制化的系统过程。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致力于在一个“现代性”缺乏的国土上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文化（最终是政治）的新秩序。国民政府的“建国运动”为在文化领域内有限的“理性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环境。但这一社会与文化的理性化不但遭遇了国内剧烈的阶级冲突和残留的但仍有强大势力的传统力量与习俗的阻碍，而且开始浮现的日本侵华战争也将任何不妥协的启蒙方案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其中思想的努力和文

<sup>①</sup> Zhang Xudong,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ization: Zhou Zuoren and the Crisis of Chinese New Culture (1927—1937)*, Ph. 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1995, pp. 17—18.

化的革新不得不面对有着极端不同政治意涵与后果的实际选择。就此而言，这场战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危机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汇合点的一个突破口。<sup>①</sup> 20 世纪 40 年代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进入我们的视野。

如果我们说“在一个超越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展现、与市民阶级生活的社会与政治层面上的理性化（不足）之间的矛盾”定义了“中国（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新文化在它的第二个或‘后五四’时期的文化复杂性与意识形态含混性”，<sup>②</sup> 那么在经过十年“建国运动”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 1940 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部分地符合了支持新文化运动理想（得以实现）的条件，比如部分的工业化，一个得到发展的市民阶层和一个较发达的商业文化，以及一个较完整（虽然有效性值得质疑）的政治、法律系统。不但如此，这一时期也获得了测试“五四”以来被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带有截然不同的路向的文化（政治）方案的体制形式的可行性。当然，日本人在占领区倡导的“新文化”也在进行一些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建设”，比如灌输亲日的殖民意识（包括学习日文与建立奴化的皇民意识）、传统主义的“贤妻良母”思想等。借此，他们也欲进行所谓的“现代性的超克”来“超克”欧美帝国主义走向现代性的进路。这一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殖民（主义）现代性”。但笔者所指的“不同的路向的文化（政治）方案的体制形式的可行性”，却指的是一股将自身认定为“五四传统的正确的，或历史上必要的继承者的强大潮流，和一个更激进的启蒙（运动）和现代性”。<sup>③</sup> 它开启了一个通向另类现代性图景的社会工程。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的总体性在解放区逐渐形成，而 30 年代萌芽的中国“公共文化”却在国统区内迅速瓦解。一种笔者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现代性”（它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前奏）最终在实践中逐渐成形。作为一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它宣称继承与超越了资产阶级（市民阶级）性质的“新文化”运动。

总体而言，如果我们说在现代中国，不同的现代性在互相竞争以获取民众对它们为中华民族未来所设定的合法性方案的认同，<sup>④</sup> 那么这鲜明生动地展示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文化政治之中，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危机和政

① Zhang Xudong,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ization: Zhou Zuoren and the Crisis of Chinese New Culture (1927—1937)*, Ph. 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1995, p. 216.

② Ibid., p. 102.

③ Ibid., p. 104.

④ 这种“竞争”不是“费厄波赖”，而是在社会矛盾导致的阶级斗争的促动与带领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较量。

治抉择达到高潮的时期。正是在这些多元化的文化之中，作为这些复杂历史经验的结晶和记录的小说（创作）引起了我们深入探究的兴趣。

### 何为历史/政治阐释学？

三个政治地域（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为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思想倾向的文化建制（它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场域）提供了多元化的舞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提供了一个缓和或调解现实的镇痛剂，以及与现代困境相斡旋的超现代意识。因为他们的小说生产与其在意识形态空间的立场密切相关，现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政治因而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在此中我们可以以形式的、同时也是批判性的方法审查他们对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征用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小说成为中国不同现代性的各种“新文化”版本的文化试验场，成为参与各种再造新的国族计划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或目睹的历史经验的象征性的建构。在这里，我们将“20世纪40年代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空间，“小说”作为一个文学和思想机制，在其中各种“新文化”得以表达自身。在此情况下，小说文本的“风格”或“形式”就成为作家寻找社会的确定性和象征的确定性体现的社会性的象征行为和政治行动。

三个非常不同的政治/文化场域的存在证明了现代中国极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是基于这些在曲折的“现代中国”成形化过程中矛盾的状况和多元的声音（包括新的文化的生产模式和体制的再结构过程）的存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场域理论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模型。因为布尔迪厄的办法着重于对文学场的配置的背景因素和作家习性的形成进行研究，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文学作品的一些审美特征。

然而，由于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学的模式，布尔迪厄的理论对于描述固定结构大体不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经历巨大改变）的文化场域十分有用，但对于经历了曲折、快速和根本再结构化的过程（如现代中国的情形）却缺乏解释能力。另外（同时部分是由于这一点），它不能充分阐述和解释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因此，这种社会学方法应当结合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论述的历史/政治阐释学的方法，<sup>①</sup> 以成为一个更全面的研究现代文学的模式。

---

<sup>①</sup> See Fredric Jameson,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这种历史/政治阐释学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经验和现象的历史化。后者作为原料，形塑和建构了表达的形式规则。或者说，社会状况和历史经验是小说文本内在的“潜文本”，因为每个文本都是重写或再结构此前的历史材料。当现实被文本拖入文本的形式结构，“真实世界”变成了文本的内容时，文本就“携带现实于自身而让其成为自身的内在潜文本”<sup>①</sup>并成为象征性的行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特定文本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存在，往往显示为一种特定的“形式的矛盾”；或者说，社会矛盾在文本中展现为某种“美学症候”的突现或断裂。文本的形式的结构由此成为社会状况和历史经验积淀和影响下的结果，形式从这个角度说就成为“内容”。

这种方法是历史导向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只是注重实证因果关系的研究，或者实证主义的、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影响的考察。它要求我们推进对历史内容和文本形式之间的交易的研究，以便阐明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形式的独特性和历史的特异性在此交织，并互相照亮对方。

这种方法给文学研究带来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最终显示在文本层次上：通过不懈的历史化，它可以最全面地解释文本中每个独特的审美细节。换句话说，历史化并不是牺牲对文本的审美素质的探索；相反，只有通过彻底的历史化，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艺术作品的审美特性。通过这种全面辩证的阐释学方法，社会—政治层面、历史层面和文本的美学层面的因素最终可以彼此阐明。同样，通过此方法，“对历史表现的实证探索”将会被“一种对历史和表现之间关系的历史性的探究”所代替。<sup>②</sup>

但要达到此目的，我们首要须检视的是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物化和乌托邦的梦想所在，因为历史的作用与印迹被包含在文学想象里。也即采取这种形式和文本的辩证法的关键在于采取一种意识形态分析。在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时，由于众多不同的异质力量与理念（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的；左派的，右派的）在彼此互相竞争，我们的目的是研究不同的阶级意识（它被折射在作家的惯习与写作实践中）为什么以及如何限制作者认识社会—政治环境与矛盾，以致常常有意识地或者在无意识中不能贯彻其美学理想（或其理念有偏颇处甚至谬误），因而设计问题重重的情节和人物，从而在他们作品中留下叙述的

① See Fredric Jameson,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35.

②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35.

缝隙，形成自相矛盾、自我解构之处，从而使其作品常常无法成为美学上的杰作。

换言之，对一个细致的意识形态分析而言，其核心在于阐释文本中显现或隐藏的“政治无意识”。它要求我们关注国内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的历史状况，后者塑造和影响了作家们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他们的不同的思想信念或倾向，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的审美价值体系；这些作为要素烙印在他们的作品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掌握在历史运动过程中文化领域的结构性转变，正如我们需要掌握其结构性关联中的动态历史经验。这正是我们需要结合布尔迪厄的结构主义社会学实践与杰姆逊的历史（动态）面向的阐释学方法的原因。通过这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我们能更精巧地阐明和解释文化作品的内在（审美形式）和外在（社会内容）因素。

要做到有机地整合内部分析和外部解释，我们需要注意到形式和内容的辩证。这个辩证法是对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论的补充：“任何话语或文体位置，既是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一个能指，也是其过剩”，<sup>①</sup> 换言之，形式是“社会、历史和审美体验的剩余价值被进行编码和一定制度化的所在”。<sup>②</sup> 这是研究两个空间，即社会空间和符号象征空间（它由作家的思想惯习、文化趣味和文学话语组成）如何互相制约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从上述理论思考回到现实的现代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经验演进的过程。政治和社会经济变化深刻影响到社会文化领域。因此，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制约了上层建筑的调整，并最终改变了人民的经验、意识和习俗。因此，中国文化的重建与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活动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或广义上所言的文化生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一个在历史中发生的文化生成的过程。它通过个人的理念构想和集体的实践努力达成。因此，政治阐释学致力于社会现实“背景”和话语文本的审美“设计”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谱系相互交织连接在一起，每个都成为对方的寓言性对应。这种“社会史”和“形式史”之间的辩证，用张旭东的话说，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作为再现的辩证法的展开的内在实践”。<sup>③</sup>

由此角度观之，形式成为“上层建筑里内容的实现”，它结晶化了

① Zhang, Xudong,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Duke: Duke University, 1997), p. 431.

② Ibid.

③ Ibid., p. 121.

“新形态的内容显现在世”的过程。因而，我们发现存在一个辩证逻辑（这一辩证是就内部和外部，或审美和政治的两个方面而言）或标准，可以用来评估艺术作品的艺术强度：

内容在形式上实现，或者没有实现，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从长远来说，是其在历史时刻里是否实现的最珍贵的指标之一，而形式本身只是内容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被实现的方式……一个艺术作品的完美并不被认为是个人艺术能力不够的结果。黑格尔在《美学》中早就告诉我们，“相反，形式的不足源于内容的不足”。<sup>①</sup>

这里的“内容”在性质上是历史性的；具体来说，它正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现代性的事物。“现代性”在这里不是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指一个历史进程：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相应的伦理道德世界观到“现代”的样式的发展转变。那么，何为“现代”，何为“现代性”，就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经验中发现。作为记录历史发生的现代叙事体裁的小说，在这里就以其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充当了现代性的（形式和内容的）载体。而由于文学文本中本身包含了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潜文本，通过阐明这些在“现实和历史”与“文学呈现”间交相往来而成为“另类中介”的“潜文本”的具体内容，通过从文本由此中介过程而显现的症状中一窥作家的政治无意识所留下的痕迹，我们就可以对作品的文化政治的内涵与对社会现实呈现的美学一致性、圆满性与强度做出评判。

### 本书的结构与对英语世界研究现状的简要讨论

本书分成三个部分，它大体上对应于其时文化生产的三个区域。第一部分“调商‘梦魇的现代’”研究沦陷区文学。沦陷区人民生活于梦魇般被封锁、压迫的境地，而不得已与此做屈辱的调停协商。第一章以东北沦陷区的萧红和梅娘为代表，探讨被称为“流亡文学”和“合作文学”的文人作品。作为流亡东北作家群代表的女性作家萧红的作品，被放在她的成长经历和流亡背景下加以讨论。从她写作的故事里，我们既能看到其早期作品中对农民英勇抗敌的描写和其苦难生活的叙述，又能在其晚期作品里感受到一个漂泊无依的灵魂和被错置的乡愁。她的小说成为陷于（半）殖民地、半传统状况的中华民族苦难生存的一个缩影。而对于在沦陷区内

<sup>①</sup>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29.

生活处于中下等的市民阶层的梅娘的小说叙事，笔者则试图将这些文本中显现的女性主义话语，与其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一种有机的勾连与对照性阅读，以便分析它们在对“五四”理想的声张中的复杂利害关系。梅娘的小说通过女性命运的展现显示出“殖民（主义）现代性”的保守倾向和广泛压制性，而一些小说也显示出“新青年”和“新女性”的变异和堕落。第二章以张爱玲作为分析对象来研究上海的“闺阁文学”。通过探析她小说里主导性的题材——它们显示了在一个被围困的社会中浓厚的婚恋焦虑——笔者深入到她表面上非政治性的婚恋小说里的复杂的身份政治的困境。她的小说展示了在被封锁的“借来的时空”中，女性深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压迫，无法实现成为中产市民的各种梦想与幻想。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现代性”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不到人民的认同和配合，民众在梦魇般的禁闭封锁生活中等待解放的到来。

第二部分“重思‘分裂的现代’”研究国统区文学。国统区民众在分裂异化的处境中生存，文化人于是大多梦想一种世界主义的自由和大同。第三章讨论无名氏和徐訏的“现代文人小说”。它们目前无论在大陆学界还是在北美都被放在“浪漫主义”的框架里加以研究。但我却认为他们是一种现代中国独特的文类，一种被笔者称为“现代文人小说”的寓言性作品。它们从根本上反映了一些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深感无奈、困惑与绝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异化的心态。他们理想中的文化普世主义受到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极大限制，因为表现为奇异的受到梗阻的幻想。第四章研究胡风领导的“七月派”作家路翎的“新左翼小说”，将它们置于其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政治困境中来加以检视，并通过角色的“主体性”和作为他们的“情感结构”的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分析加以阐明。这种小说作为左翼小说在40年代的新发展，表现当时的“新左翼青年”力图突破“分裂的现代”的困境，通过走入民间与民众“结合”来增强自身力量和影响力；但由于无法有效地将个人主义的权利与民族救亡与阶级解放的要求加以协调，而最终无法达到一种新的“理性”。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步履维艰，终于无法在内外矛盾夹击中延续其分裂异化的局面。

第三部分“求索‘新民主主义的现代’”研究解放区的文学。解放区的群众在一种前所未见的、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在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下被发动起来与旧世界抗争，并探索新世界的轮廓。第五章讨论赵树理的“农民故事”以及他所设想的一种另类“新文化”。赵树理的故事以其本真性内容所呈现的本土风味表现了通往现代中



国的另一条道路，或中华民族成为新的国族的一个新趋势。而他所面临的创作困境也体现出中国现代社会的终极悖论：对于一个前工业社会，没有充分经历资本主义现代“合理化”过程的国族，其另类现代进路如何进行？赵树理和他的同志们所期望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缺少可靠的来源：尽管据称他们将吸收一切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但如何吸收、如何改造却是难题。坚定的革命意志有助于推翻旧世界，但如何建设新世界却是个更难的课题。第六章检视从新文学阵营里出来的资深作家丁玲与她创作的“新女性文学”。对于从国统区过来的经受过五四文化洗礼的解放区作家，其艰苦的思想转变和自我改造既是由身处其时其地的政治压力所致（以及他们相应的自我审查与纠错努力），也是伴随着一个有着新结构和新范式文化场域调整的结果。丁玲在小说创作中主题和风格变动所体现出来的身份转变（大多数是关于“新女性”遭遇和命运），虽然似乎解除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和“存在主义”烦恼的困境，却仍然留下了很多需要填补的缝隙和裂缝，它们可以同时被视为她所支持与宣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困境。这一困境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现代性”只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渡状态，它自身无法包含一种独立存在的新型伦理道德和革命价值观。

在讨论小说文本中呈现的历史内容和文学形式的辩证之外，我在每个部分的导言里还处理了与这个区域相关的理论问题（在每个章节的第二部分，一般来说笔者也安排一节从更抽象的理论层面探讨该章节作家创作的小说的文体特征）。在沦陷区里，笔者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雅俗文学”和“中阶文学”问题，并以张恨水早期致力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努力为例，进一步说明“中阶文学”的特征。在国统区部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被重新评价，从中我们见到该区域仍然限于自由人文主义精神和五四式启蒙思想的左翼作家希望与共产党的文艺创作思想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斗争。在解放区文学部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被重估，以理解一个在有着自身的（文化政治）逻辑和变动的社会结构的区域里，毛泽东对锻造一个新的文化—政治民族和“革命新人”的设想如何在具体的文化政策上体现出来。

对这些作家的选择和对这一结构框架的安排，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在英文世界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者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从20世纪10年代的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的这一时期，而对现代中国文学在最动荡的40年代的转变没有进行系统的探讨。虽然有下列一些研究个别作家和特定地区的书目可资我们参考：